

世俗時代的意義探詢

五四啟蒙思想中的
新道德觀研究



段煉
著

世俗時代的意義探詢

五四啟蒙思想中的
新道德觀研究

段煉
著

世俗時代的意義探詢

——五四啓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研究

作者 / 段煉

責任編輯 / 林建和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2 年 8 月 BOD 一版

定價：33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

導論	1
第一章 世俗時代的開啓：超越世界及其瓦解	31
第一節 天：儒家的德性之源.....	33
第二節 「仁」與「禮」的道德圖景	45
第三節 從「天理」到「公理」：世俗時代的開端	51
1.德性的退隱：從「理與勢」到「體與用」	53
2.德性的旁落：來自「天演公理」的挑戰	60
3.德性的沉淪：「力即理也」	67
第四節 「個人」崛起：規範倫理的解體.....	76
第二章 五四時期的道德轉型	89
第一節 「自作主宰」的人生：個人主義的興起	91
第二節 當「功利」取代「善」：德性倫理的解紐	113
第三節 呼喚「穆姑娘」：迷亂之現代人心	127
第三章 個人德性的重建	143
第一節 五四的功利主義：「精神的」超越「物質的」	145
1.快樂的「質」與「量」：兩種「功利主義」	145

2. 德性目標：人生境界的追求	150
3. 道德實踐：探詢「內在價值」	156
第二節 五四的個人主義：從「小我」到「大我」	165
1. 「群」的嬗變：「無中生有造社會」	166
2. 人生價值：在「小我」與「大我」之間	174
3. 「不朽」：從「真我」到「真社會」	182
第四章 公共倫理的證成	193
第一節 「公德」、「私德」與共同體	195
第二節 從個人德性到公共倫理：「三綱」的抽象繼承	205
第三節 追尋德性：在「政治共同體」背後	219
結語 這個世界會好嗎：世俗時代的道德反思	243
參考文獻	253
後記	269

導論

第一，問題的緣起

1895年至1920年初，是中國思想文化從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轉型時代」¹。其中，五四時期又是轉型時代的高潮。從思想內容的變化上看，轉型時代是一個超越價值世界瓦解的「世俗化」的時代²。隨著晚清以來「公理」世界觀對「天理」世界觀的衝擊，構成思想文化核心的基本宇宙觀和價值觀發生動搖，並由此導致這一時代的道德價值取向發生了失落與迷亂。繼晚清以來儒家規範倫理（三綱五常）解體之後，到了五四時期，原本具有超越內涵的儒家德性倫理（仁學宇宙觀）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念較之晚清有了更加顯著的變化：一方面，現世的「快樂」與「功利」的主張，取代了傳統儒家倫理中「善」的超越地位。另一方面，強調意志自主的個人主義，在五四時期也得到極大發展。隨著個人從傳統中獲得解放，自由意志逐步恢復活力。人們相信，依據多元的自由個性和價值選擇，每個人都在「功利」與「快樂」的引領下，對自己的人生「自作主宰」。可以看到，在現

¹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

² 所謂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指人們的價值、信念和制度規範的正當性，不再來自超越世界，而是人們依據自由的意志和理性自我立法、自我決斷，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命運，設計理想的未來。許紀霖：〈世俗化與超越世界的解體〉以及相關主題筆談，見許紀霖主編：《世俗時代與超越精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代中國世俗化的過程中，道德價值觀念的正當性不再來自於超越世界，而是由人們自我決斷，人成為了道德價值的立法者。

世俗時代意味著道德背後超越世界的解體，五四的道德觀念建立在了個人的幸福與快樂的世俗層面上。然而，在一個道德祛魅的世俗時代裡，人生價值與生活意義還有追尋的必要嗎？現代社會是否需要共同德性和超越精神來維繫和延續？在一個缺乏公共德性和文化認同的社會裡，價值的普遍性可以僅僅依靠程序公正實現自我證成嗎？知識分子關於意義問題的思考，不僅貫穿於儒家道德超越價值逐漸瓦解的近代中國，而且在中古以來基督教文化衰落的西方世界，同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³。現代社會中的個人是具有「內在深度」、可以自作主宰的個體。每個人都擁有了滿足功利與快樂的權利，每一種生活都來源於對於人生意義的自我理解。然而，當個人疏離了德性、社會無視公共的價值認同，共同體果真如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所言，僅僅依靠一套具備政治正義的秩序就能實現價值證成嗎？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等社群主義者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當人們置身於一個缺乏超越精神的現代社會，個人除開失去了更大的社會和宇宙視野之外，還失去更高的目標感，終日沉溺於尋找一種「渺小和粗鄙的快樂」⁴。人們因為熱中於私人生活的滿足，從而失去了更為寬闊的道德和情感的視野。目標感的喪失

³ 西方社會的世俗化歷程以及現代價值觀的形成，見布林頓（Crane Brinton）：《西方近代思想史》第四章〈第十八世紀：新宇宙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理查德·塔納斯（Richard Tarnas）：《西方思想史》第五篇〈現代世界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

⁴ 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7頁。

與人生狹隘化相連，缺乏德性規約的個體，往往表現為一種「無公德的個人」⁵。以自我為中心的唯我主義的盛行，使得人們的生活中缺少對他人及社會的關心，也導致了對更大的、自我之外的問題和事務的封閉和冷漠，其後果是個人生活的狹隘化和平庸化：一方面，個人成為物慾橫流的時代裡瘋狂逐利的個體，因此，他們的集合也只能形成在物質私欲面前俯首聽命的庸俗大眾。另一方面，隨著德性和超越價值從公共領域的退卻，個人熱中於一己私利，對他人和社會事務漠不關心。即使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的個體，也不再願意從公共文化的共同價值出發，將參與公共事務作為人生重要的意義所在。人們樂於封閉在私人領域中享受生活，而不願主動地擔負起對於公共領域的責任。因此，對德性的漠視必然導致個體政治自由的喪失。這一消極行為的災難性後果便是，個體必須獨自去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而這正是孵化威權主義的理想溫床。

世俗時代裡的意義探詢，是現代社會中具有普遍性的複雜議題，也是每一個現代人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本書無意在規範層面，全面回應這一因世俗化帶來的意義難題，而是試圖將這一思考，引入清末民初中國轉型時代的思想史脈絡之中，對五四時期啟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加以研究⁶。其原因一方面在於，以《新青年》

⁵ 關於「無公德的個人」在當代中國的興起及其後果，閻雲翔作了精彩細緻的刻畫與分析。見氏著：《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 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⁶ 寬泛地看，「道德」(morality)與「倫理」(ethics)常常被視為同義詞或近義詞，兩者在原始語義上都與品格(character)、習慣(habit)相關，也都以「善」為追求目標。本文在對道德問題作概論性敘述時，通常對兩者不加區分。同時，就兩者的差異而言，一般來說，道德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與超越價值相連的、追求「善」的理想；倫理則大體表現為道德的行為規則尺度。見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倫理學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33-34頁。就本文涉及較多的儒家道德而言，

和《新潮》為核心的啟蒙知識分子陣營，既在五四時期開道德變革的風氣之先，也對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對人生觀和德性問題，有著細緻思考和廣泛實踐，在當時的知識階層中具有典範意義。另一方面，就倫理本位的傳統中國社會而言，儒學具有「以道德代宗教」和「以倫理組織社會」的泛文化整合功能⁷。然而，隨著清末民初普世王權的瓦解和意義世界的衰微，五四的知識分子面臨著宇宙觀和人生意義的危機。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之下，他們將以怎樣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規範，更新儒家道德的精神超越資源，進而重塑人生和世界的意義秩序，成為轉型時代心靈秩序重建的重大問題。

因此，本書立足於近代中國世俗化轉型的歷史背景，通過對五四時期新道德觀的研究，試圖回應如下具體問題：當功利與快樂成為這一時期新道德觀的基礎，五四時期是否提供了現代道德的價值標準；還是因為失去了價值超越性，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道德相對主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教改革以來的西方現代社會，通過分離德性倫理與規範倫理，來應對世俗時代的價值多元化挑戰，那麼，在五四時期的新道德觀裡，德性與倫理之間又形成了怎樣一種關係？在五四過去將近一個世紀的今天，通過對近代中國思想史脈絡的「重新問題化」和對五四新道德觀的自我理解，或許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把握世俗時代的價值命題，為多元現代性賦予更加豐富的內涵。

其中的「仁」，是指的人的內在之善涵養與發展的最高層次，屬於儒家道德體系中「德性倫理」的部分；而其中的「禮」，包含著在「善」的指導下的人際關係和行為準則，屬於儒家道德體系中「規範倫理」的部分。本書第一章第二節對於「仁」與「禮」及其的關係進行了闡釋。

⁷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年，第95頁。

第二，研究綜述

關於五四啟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及其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意義，在過去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論述⁸。特別是近 30 年來，國內外思想學術界對於這一歷久彌新的話題，有了更加多元而深入的理解與闡釋。這些研究，有的從文化思想或歷史哲學的角度出發，對於五四道德觀念進行宏觀闡釋；有的從參與者本人的回憶或活動入手，描繪出轉型時代中國社會變動不居的道德狀況；有的一方面檢討五四時期道德革命與道德重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相互消長，一方面在新舊道德的衝突之間，探索推進中國歷史演進的力量與途徑。而新一代的思想史研究者，則試圖將轉型時代道德觀念的失序與重建等問題，與諸如「世俗化與超越價值」、「個人價值與公共認同」、「政治正當性」等一系列更具有普遍性的歷史、哲學和文化的議題聯繫起來，將其「重新問題化」。在新的問題意識的引領之下，研究者力圖開啟對於中國現代思想史脈絡和多元現代性的理解，以期更加深刻地反思五四時期的道德觀念⁹。

⁸ 1979 年，臺灣學者周陽山在紀念五四運動 60 周年的文章中即已指出：「六十年來，有關五四的篇章，在字數上恐怕早已過千萬大關。」見周陽山：〈五四與中國——論有關五四的研究趨向〉，轉引自蕭延中、朱藝編：《啟蒙的價值與局限——台港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8 頁。

⁹ 限於篇幅，「研究綜述」部分只能選取近 30 年來，在五四時期道德觀念研究方面較有代表性的著述，大致以時間為序，梳理其中學術理念演變的脈絡，並簡要評述其學術價值。此前的重要研究成果，如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常乃惠著《中國思想小史》等，將在正文相關章節以註腳

(一) 20 世紀 70 到 80 年代：關注「個人覺醒」與「反傳統」的道德啓蒙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以來，隨著「文革」的結束和新時期思想解放的開始，學術界對於五四時期道德觀念的研究，大體上在「弘揚民主與科學」、「反傳統」、反「封建（專制）主義」等頗具現實關懷的理論主題之下展開，描繪出一幅五四時期新道德與舊道德交鋒的歷史圖景。1979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周揚在報告中把五四運動視為 20 世紀「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之一，並高度評價「有史以來，還不曾有過這樣一個敢於向舊勢力挑戰的思想運動，來打破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舊傳統，推動社會的進步」。他說，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從內容來說，也只能說是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有了初步的認識，但是對孔學和維繫封建社會的舊禮教三綱五常、舊道德忠孝節義的尖銳批評，不能不使人為之震動」¹⁰。周揚對於五四時期的道德觀念的理解，也成為了文革結束後主流意識形態和學術界闡釋這一話題的基調。

在這一時期的論著中，彭明將五四運動比作衝破「中世紀黑暗局面」的西方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在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下，向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國粹、舊

形式出現。

¹⁰ 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年，第 8 頁。

文學等各個方面展開了猛烈的進攻，做出了很大貢獻」¹¹。侯外廬在同時期的文章中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說：「五四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特點，就是揭櫫民主與科學，批判與它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和舊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他看來，五四時期新思潮的最大特點，就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對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開了全面的空前猛烈的批判」¹²。王正萍、蔣國田在〈五四運動與思想解放〉，金沖及、胡繩武在〈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徐宗勉、朱成甲在〈論五四時期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蔡尚思在〈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實踐意義〉，劉啟林、陳瑛在〈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道德——回顧五四時期道德領域上的一場鬥爭〉，張岱年、樓宇烈在〈五四時期批判封建舊道德的歷史意義〉，孫思白、韓凌軒在〈「五四」以來反封建文化運動之史的考察〉等論著中，大都將論述的焦點集中在新舊道德的衝突之上。他們對於五四時期道德變革的判斷與理解大體趨同，即在五四之前，「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專制主義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即「共和制度的存廢，決定於人們的思想覺悟。只有人們普遍有了民主的覺悟，才能實現民主政治」¹³。因此，他們把「開展批判和清除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鬥爭，喚起人們的覺醒看作是頭等大事和當務之急」，所以五四是「以反對封建文化為中心的思想解放運動」¹⁴。

¹¹ 彭明：〈民主、科學和社會主義〉，同上，第 198 頁，以及氏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1999 年修訂再版）。

¹² 侯外廬：〈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思潮〉，同上，第 321、326 頁。

¹³ 徐宗勉、朱成甲：〈論五四時期的反封建思想革命〉，同上，第 449 頁。

¹⁴ 王正萍、蔣國田：〈五四運動和思想解放〉，同上，第 364-365 頁。

黎澍在〈關於五四運動的幾個問題〉的探討中，則以相當多的篇幅談到五四的道德革命中崛起的現代「個人」。他認為「五四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使得「長期匍匐在專制統治下的奴隸們第一次有了作為人的自我覺醒，認識到了自己是獨立的人，有做人的權利」——雖然在作者那裡，這種「自我覺醒」仍被視為「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啟發的」¹⁵結果。金沖及、胡繩武在文章裡，也特別強調五四的知識分子用來反對封建舊文化、舊禮教的思想武器，主要也是「資產階級的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人格』和『平等人權』的學說」，「他們激烈地反對封建禮教提倡的奴隸道德，著眼點也在於它妨礙了個人的獨立和自由」¹⁶。孫思白、韓凌軒的文章強調五四的道德革命，無論在深度、廣度還是決裂的精神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¹⁷。胡繩則敏銳地注意到五四和戊戌維新在反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上的思想關聯。他指出，五四掀起的道德革命之所以較之戊戌維新的變革更加徹底，其根源就在於五四的知識分子已經大膽質疑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孔子之道』，即封建的倫理道德在現代的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是否還應當保存」。他特別強調進化理論在形成五四道德觀念中的巨大理論助推力，也精確地指出五四的知識分子試圖「以思想的力量為新的社會和國家奠定基礎」。在這篇題為「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與科學」一文中，胡繩明確地指出「個人主義」是五四新信仰、新思想的核心。而打破「綱常名教」的封建枷鎖，爭取個性的發展和個人獨立自主

¹⁵ 黎澍：〈關於五四運動的幾個問題〉，同上，第274頁。

¹⁶ 金沖及、胡繩武：〈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同上，第413頁。

¹⁷ 孫思白、韓凌軒：〈「五四」以來反封建文化運動之史的考察〉，同上，第525-526頁。

權利，就在於「一切要從自己的內心出發，要順從個人的意志和願望」¹⁸。

深受「文革」結束後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的影響，這一時期對於五四道德觀念的研究，本身包含著研究者強烈的道德激情與歷史反思意識。當時的學術界已經較為普遍地注意到五四時期新舊道德衝突的歷史情境。圍繞著以《新青年》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五四啟蒙思想家對於新道德的相關論述，研究者對於一度諱莫如深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五四道德觀念中的新內涵，初步給予了歷史性的評價與肯定。不過，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尚未超越「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的單向度解釋模式。在學術理念和理論話語上，對於五四時期道德觀念的研究，也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簡單化約和政治圖解的傾向。

（二）80 到 90 年代：發掘「態度同一性」背後的道德「兩歧性」

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隨著學術界開放與交流的不斷深入，隨著「文化熱」在 80 年代思想學術界的瀰漫，理論教條與意識形態的束縛得到極大的擺脫，五四時期道德觀念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如果說，前一時期的研究者依靠「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義革命」、「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等理念，構築出一幅五四道德觀念的基本圖景，那麼，到了這一時期，研究者開始逐步深入道德背後的社會和文化層面，意識到「必須正視五四意蘊的複雜性，多層面地探討五四的實質，如此，才可能發現五四當代圖像及

¹⁸ 胡繩：〈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和科學〉，同上，第 299、304-307、311 頁。

其世界性意義」¹⁹。對於「態度同一性」背後道德觀念多元化及其內在張力的分析，對於現代價值與傳統理念之間複雜關聯的闡釋，成為 20 世紀 80、90 年代乃至之後一段時間中五四道德觀念研究的深度所在。

海外研究者早期或同期相關論著的引入，極大地拓展了這一時期大陸學者五四研究的新思維，也有力地推進了五四研究學術範式的轉型。周策縱在寫於 1960 年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的第 12 章中，巨細靡遺地分析了新思想和對傳統的重估，非常明確地談到新思想中現實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成分以及新方法中實用論、懷疑論的因素，還包括它們在打破中國傳統倫理和思想中的重大意義。在該書的結語部分，作者敏銳地覺察到，五四時期新道德觀中強調的個人解放，「與西方所宣揚的個人主義並不是一回事，與西方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意義也不盡相同」。「五四時期對於個人和獨立判斷的價值確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但同時也強調了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²⁰。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則將論述的焦點聚集在五四帶來的道德觀念變革與知識分子對於現代性的探求之上。在該書第二章〈新知識分子的出現：世代合作與論爭〉以及第三章〈五四「啟蒙運動」〉中，作者注意到，世界觀的改變對於五四道德觀形成的決定性作用。「中國的啟蒙先驅畢生獻身於那些超越獨特傳統文化的崇高理想。

¹⁹ 余英時等：〈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也非啟蒙運動「五四」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前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年。

²⁰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新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00-433 頁、第 492 頁。

這些先行者們在致力於改造國家認同的基礎，同時也承認此種超越性理想的迫切性。在民族革命的範圍內，他們堅持進行艱辛而又必要的價值觀革命。當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時，他們卻堅持追求新的世界觀（worldview）」²¹。在道德觀念上，對於五四的知識分子而言，改造自身與改造世界相結合是他們最鮮明的精神特徵。

作為 80 年代在大陸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之一，《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收錄了部分美國學者研究五四的早期成果。在〈《五四運動的反省》導言〉中，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以宏闊的視野，溝通了「傳統」價值與「現代」理念之間的看似遙不可及的鴻溝。他指出，與那種「中國傳統」與「現代西方」的截然兩分的看法相反，五四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思潮和西方思潮之間尋找各種了類似性和相融性。「他們在某種超文化界限的關係中看待問題和論證的傾向」²²。而在對章炳麟、王國維和《學衡》派的深度關切中，夏洛特·弗斯（Charlotte Furth）分享了與史華慈一致的觀點²³。實際上，這些看法也滲透到了由史華慈本人撰寫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第 8 章〈思想史方面的論題：五四及其以後〉的部分內容之中²⁴。而當時國內學術界將五四視為一種「個人主義運動、徹底反傳統文化運動

²¹ 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新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 14 頁。

²² 本傑明·史華慈：〈《五四運動的反省》導言〉以及〈論五四前後的文化保守主義〉，見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6 頁以及第 149-163 頁。

²³ 夏洛特·弗斯：〈五四與近代思想文化〉，同上，第 90-100 頁。

²⁴ 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456-504 頁。

的看法，則在阿理夫·德利克（Arif Dirlik）對於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社會」觀的強調中得到平衡。德利克注意到，在五四知識分子的道德世界之中，「社會的改革必須超越個性解放的範疇，而擴展到社會和經濟平等的問題，以及社會和政治進程中的大眾參與問題」²⁵。

林毓生在這一時期的論著中，特別指出五四時期的特徵之一是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全面而整體」的反抗²⁶。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他通過對陳獨秀、胡適、魯迅三個個案的細緻研究，試圖表明五四之所以要求打倒整個傳統文化，其原因就在於當時的知識分子未能從儒家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有機式一元論思想模式中解放出來²⁷。林毓生的這些看法，照亮了過往五四思想史研究的許多暗角，也在當時思想文化陣地上引發了持久的紛紜聚訟²⁸。不過，他通過普世王權的崩潰引發的政治秩序瓦解和心靈秩

²⁵ 阿理夫·德利克：〈五四運動中的意識與組織：五四思想史新探〉，見《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第 61-62 頁。

²⁶ 這一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本傑明·史華慈與莫里斯·梅斯納（Maurice J. Meisner）的支援。兩人均認為，1911 年以來令人絕望的政治和社會現實所導致的憤怒情緒，對於啟蒙思想家全盤性的反對傳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使得他們相信，中國的傳統文化遺產是「中國在近代世界上處於困境的根源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障礙」。見本傑明·史華慈：〈《五四運動的反省》導言〉，見《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第 7 頁以及莫里斯·梅斯納：〈對五四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文化反傳統主義的反思〉，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 年，第 223 頁。

²⁷ 林毓生：〈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見氏著：《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以及《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

²⁸ 當時學界受「文化熱」影響，對林毓生這一看法的反思，多從五四知識分子從事的是「自我批判」而非否定民族傳統的角度立論，如耿雲志：〈中西結合，創造新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見《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